

南懷瑾 總序

黃曉京 著



方法的日本

——超越資本主義與
亞洲的文化革命

大風出版社



南懷瑾 總序

方法的日本

——超越資本主義與亞洲的文化革命

黃曉京 著

大風出版社



方法的日本

——超越資本主義與亞洲的文化革命

作者：黃曉京

文字編輯：梁 曉

排版編輯：李玉娥

美術設計：廖 煒

出版：大風出版社

香港薄扶林置富道 11 號 3 樓 A 座

電話：(852) 2550 8911 傳真：(852) 2550 8711

網址：<http://www.strongwind.com.hk>

印刷：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

國際書號：ISBN 978-988-18380-6-3

出版日期：2011 年 4 月第一版

定價：港幣 98 元

香港總發行：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
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

電話：(852) 2150 2100 傳真：(852) 2407 3062

新加坡總發行：商務印書館（新）有限公司

211 Henderson Road #05-4, Henderson Ind. Park, Singapore 159552

Tel: (65) 62783535 Fax: (65) 62786300

© 大風出版社 2011

Strong Wind Press 2011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總序



自從二次大戰以來，世界上發生了太多的變化，國際間交往更趨頻繁，相互競爭牽制。先是猶太人戰後在中東地區建立以色列國，後來發展成嚴重的中東問題。二戰後，非洲的殖民地國家，都脫離了白人的統治，宣告獨立自由了，只不過，自由卻帶給他們貧窮疾病，和更多的問題。

歐洲在二戰時受創極重，經濟上困難尤甚，有遠見者不久即開始研究整合歐洲及歐元的發行。由於美國參加作戰，美國富有，美國出頭了，語言文化也隨之而來。好萊塢的電影，美式牛仔褲及速食，逐漸風行全球。傳統以法文為國際契約的習慣，也漸漸用美式英語取代了。

亞洲受美國的影響更大，佔領日本，改造日本，韓戰越戰，美國試圖掌控全世界。

戰後科學的進步和新發明，如電視電腦

的普遍化，民用航空的發展進步，使地球上的國家都成為緊鄰。醫藥的大幅改進，人口的增長，使競爭更加激烈。加上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，核子武器的發明，造成國際間的互動更為複雜。

不論世界如何發展和變化，關係人們存在和生活的，基本上仍然是文化經濟問題。

中國在閉關二十多年後，終於開門面對世界。中國的發展改變了與其他各國的關係，國際的平衡也產生更多的變數。在自我奮鬥和發展的過程中，中國遭逢的問題，較之其他國家更加複雜。它目睹了蘇聯共產制度解體，面對自身文化的何去何從，以及經濟制度的方向等等嚴重問題。

在各種嚴苛的挑戰下，中華民族，像以往一樣，總有許多知識分子，懷抱為祖國打拚的熱情，運用智慧，研究問題，提出分析見解，扮演著智庫的角色。

在這些知識分子之中，有一個名叫王小強的學者，多年來投身研究工作，發掘問題，提出解決方案。

在一九九三年春季，老友許鳴真先生自北京來香港相敘，同來攜有王小強君，許老特意介紹，慎重託付，望予照顧指引云云。

我見小強，挺拔強項，大有不合流俗的器識，儼然一士諤諤的風格。但世俗中豈可或少這樣一類特立獨行的人物，當下便欣然接納。

小強從一九七九年開始，投身中國改革的調查研究。一九八九年赴美，先後就讀於克羅拉多州立大學經濟研究所，以及匹茲堡大學公共管理及國際事務碩士研究班，以後再赴英國，在劍橋大學得到政治與經濟系博士學位。

小強對經濟問題有深入的研究。經濟問題因各國文化背景不同，時代不同，實行起來各自有別。人們都知道美國自稱為民主國家，但是，早有學者及有識之士指出，民主是一種救時的方劑，正如莊子所謂：「仁義者，先王

之蘊蘊，可以一宿，不可以久處也。」一個國家的社會體制，只能適用於自己本國，輸出到別國就會水土不服而變調。經濟政策也是如此，各國只能依照自身的特點，調整適合自己的經濟政策。

小強後在香港的大學和機構繼續研究工作，並成立桑尼研究公司。他全力以赴，孜孜不倦，他的文章和著作，發表於中外許多雜誌和文獻中，現在經過整理彙集，陸續印行出版。在出版的一系列書籍中，有《再造一個香港》，《「文明衝突」的背後》，《摸著石頭過河的困惑》，還有其他人物不同角度的探索。

小強的文章言論每有意氣。其實，一個有抱負的青年，有感而發，大多有這份的習氣。這正如宋儒辛稼軒所說的：「昔越王見怒蛙而式之，曰：是猶有氣。蓋人而有氣，然後可論天下事。」以此觀之，亦可為之展頤了。

近年來，小強留港時間較久，對香港各方面都加深了認識，希望香港能更加進步，生活美好。尤為難能可貴者，小強自從由歐美歸來，除政治經濟問題外，也著力於中華歷史文化方面的研討。融合東西文化，視野廣闊了，他鑊而不捨地努力，提出所知所見，目的無他，企能引起更多學術討論，共同為國家社會的進步貢獻心力。

小強嘗謂，學術非為一己之私，各家見解雖有不同，但經過論辯，必能激蕩出完美的政策方向。

古人云：「道並行而不悖」，見仁見智，互擅勝籌，匯合各方主觀，相互容納，即為集思廣益。今值桑尼系列書籍出版之際，特為之序，有鼓勵也有鞭策，並致祝賀之忱。

南懷瑾 於香港
二〇〇四年八月

— 序 言 —

亞洲的方向

A

談起日本總有說不完的話。

但若幻想用理論的方法把話說清楚，往往又只是徒勞。

日本的問題千頭萬緒，大幅簡化，歸根結蒂，就是一句話——投身亞洲還是背叛亞洲。

但是話未出口，似乎就聽見了中國人慣用的反唇相譏：少來這一套！亞洲怎麼啦？我們就是亞洲！

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，想強調「人民」的意味時的遭遇一樣：人民怎麼啦？我們就是人民！……於是在那個所謂思想解放的時期，我們無法討論人民與底層的立場，與特權階層的挫折並不相同。

言及日本，莫談理論，還是講個真實的故事。

1972年脫離日本輾轉抵達阿拉伯地區，決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鬥爭的一小批日本青年——他們為自己命名為阿拉伯赤軍——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（PFLP）的戰鬥序列，首先接受游擊戰訓練。在貝魯特的海中進行游泳訓練時，不幸發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，他的戰友檜森孝雄為護送遺骨回到了日本，未能參加以後的軍事行動。

當時 25 歲的學生檜森孝雄，從那一天開始了他孤膽的抗議活動。一直到 54 歲辭世，他持續了 30 年之久的對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支持：絕食抗議、遊行靜坐、宣傳救援，最後選擇 54 歲 3 月 30 日即「巴勒斯坦土地日」這一天，他在東京日比谷公園的海鷗廣場燒身自殺。

在留下的遺書中他這樣寫道：

我感到，為解放而組織起來的巴勒斯坦的人們，是我近處的友人。日本正在急於增強侵略戰爭的體制、變成非常危險的國家。但是，追究侵略戰爭責任謀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亞洲並不少見，我也一直希望能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。高度發達的科學的世界，卻帶來了比古代殘酷得多的侵略與屠殺的時代。做為人最寶貴的、彼此關懷和分擔痛苦之心，正被慘忍地踐踏蹂躪。

對以色列及其後臺美國、還有充當它們盟友的日本進行的抗議，雖規模小但在日本持續著。我也要參加其中，成為這抗議的一員。

《水平線的彼岸》，（東京）風塵社 2005 年

去年歲末（2010），我帶著女兒，站在了海鷗廣場。

一位白髮蓬亂的檜森孝雄的昔日戰友，聲音哽咽地給我們講解，指點著燒身抗議的位置和細節。確定位置的地標，是一棵從香川縣移植的橄欖樹。

原來，檜森孝雄就背靠著這株樹，如依偎著他獻身的巴勒斯坦。在東京灣吹來的夜風中，他的戰友告訴我，遺體燒成了焦炭，但只有前胸一小塊皮膚未燒。後來在檢察遺體時人們才發現：檜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國旗貼肉纏在身上以後、才來到海鷗廣場的。那一天他撲倒後，只有胸前的一塊皮膚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來，如留下了一個尚未解讀的日本精神，以及他以命相諫的——日本的方向。

我以為，那也是中國的方向。

B

明治的時代，孕育了諸多日本的「志士」。值得重新俯瞰他們思想的原因，是因為他們的思想不僅僅主導了那以後日本的走向，甚至以變種的形式，潛在地影響著今日中國。

如長州藩的吉田松陰，因思想激進觸犯法度而被捕，囚禁中寫下啟蒙的《獄是帳》。但是他的發憤之作，卻一面教導對俄美列強的恭敬、一面宣言對中朝鄰國的野蠻：

既與魯西亞或亞墨利加一旦締約，決不可因我破約而失信於戎狄……滋養國力，使易攻取之鮮滿支那順從……得失之壑乃至土地，可就鮮滿奪以填償之。

影響更大的是福澤諭吉的文明論。福澤諭吉思想的核心要義，就是成為帝國並實現殖民主義、吞噬弱小亞洲的「窮親戚」。

為今日謀……不可猶豫於鄰邦……毋寧脫離其伍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。其與支那朝鮮交際之法……徑以西洋人待此之風予以處理可也。

脫亞入歐，成了一個古怪的謎識。日本至今對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結論。但是中國朝鮮卻一直催促逼迫，警告它只要不放棄脫亞入歐的方向，就得不到亞洲的信任，就永遠都是「加快復活軍國主義和狼子野心不死。」

也許今日的中國，正朝著明治日本的老路舉步。今日

重提阿拉伯赤軍孫大聖，只緣脫亞入歐的妖霧又重來。

批判只有在矛頭敢於對準自己時才稱得起批判——如我們對待日本，解剖的手術刀必須對準大中華的天朝帝國思想。已經應該指出：在今日的中國，至少在一個個精英的圈子，他們的憂國宏論之中，遊走著、甚至瘋狂泛濫著一絲與脫亞入歐的明治日本相似的聲音腔調。

在今日繁衍的精英裡，在天下己任的「士」中，方興未艾的大國主義和對亞洲弱小民族的歧視，正如一種致命的癌，於無聲處，悄無聲息，向著中華天朝的眼、目、耳、鼻、骨骼、髓液乃至心眼大腦——危險地傳染。

舉例則紙短角多，若一言以蔽之，必須說：

如何對待亞洲「還沒富起來」的弱小國家，如何對待自己地盤之內「非我族類」的人民——才是中國人特別精英們在大搞南水北調、重畫省區、低碳環保、亞丁護航、海島爭端等大功偉業之前，先要從零學起的頭等大事。

黃曉京書中最耐人尋味的部分，也許是關於天下國家與西方式民族國家的分析。他說：「天下國家觀，也有人稱之為文明國家觀，終將取代資本主義的民族國家，這也許是亞洲的文化革命的歷史含意。」

這一思路源自顧炎武的思想。顧炎武預言般地、最早區別了亡國與亡天下的不同：

易姓改號，謂之亡國。仁義充塞，而至於率獸食人，人將相食，謂之亡天下。知保天下，然後知保其國。保國者，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；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。

這簡直是一篇摒除狹隘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宣言！但是，既然遠見卓識被放逐於書卷而不得實施，時至今日就變做了不祥的讖語。恐怕，「亞洲的文化革命」到了它

以一齣洶洶的歷史活劇上演之際，伴隨著的，也許將是恐怖的流血，與無邊的遺恨。

C

我在日本時，也曾度過與黃曉京近似的艱難時光。後來在寫作關於日本的隨想錄《敬重與惜別》時，又直接與他深談，得到過許多的教益。他編纂的明治初期漢詩，出自眾多的日本精英與思想家之手，雖然中國人讀著會覺得太乏詩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——但字裡行間描畫的，確實乃是驕狂活躍在那個時代的、脫亞入歐的野心。

——如同某種形式和思想的對立，阿拉伯赤軍的成員留下的，不是漢詩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。

如重信房子在獄中出版的短歌集《把茉莉插在槍口》。其中滿滿記下的，是他們青春作伴的鬥爭剪影、以及一股徘徊於短歌行間的、獻身被剝奪與被壓迫的亞洲人民的忠誠。然而，最為令人震驚也最發人深省的，乃是如下一首短歌。

パレスチナ わがまほろばの 崩れゆく 空のみ
高し ジェニンの町よ

(巴勒斯坦，我的美之家園，正坍塌崩潰，唯天穹
高高，傑寧的街鎮哟)

抄錄日文原作並把粗淺的釋意寫在括號裡，不僅為了讓大方之家能依據原文審斷，也因為我很難找到一個準確的譯法。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，不僅難在格式的生疏、不僅難求語詞的對應；最使我感覺困難的，是對於其中一個含義重大的古語——まほろば的解釋、強調、和意味的傳達。

まほろば一詞，可以把它看做一個「大和」的同義詞來接近，但又不能譯它為「大和」。它有「理想國、和平鄉、淨土、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園」等寓意。它屬於日本的私密，並不能與人分享。唯作者能發奇想，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個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——此一筆不僅在日本文學史上、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聞，其價值無論怎樣評價也不為過高。

是的，成為日本的狹隘愛國主義象徵的大和理想鄉，已被置換為巴勒斯坦、置換為被壓迫與被侮辱的他者，包括亞洲。在我們毫無察覺之際，日本的先驅者，早已朝著「亞洲」這一方向，邁出了他們的步伐。

問題留給了中國。

對於我們的國人而言，這樣的問題存在嗎？

所以我想說——

與那些躲在帝國主義褲襠裡高喊民主的鬥士不同，更與孿生於西方價值糞便裡作藝術態的詩人兩樣；面對日本，我們並不想彼此確認民族主義。我們想做的是——把檜森孝雄、岡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滿是遺恨的胸中，懷著對烈士的追悼之意，一同探求新的亞細亞主義、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納爾、即國際主義的道路。

——謹為贅序。

張承志

2011年1月10日，北京

2011年2月16日，再改

—— 作者的話 ——

1990年代末，在香港的一個小山村樟樹灘，再見王小強。一場風暴之後，他留英回來，退出主流，幾成隱士，唯研究國事天下大勢，依舊全身投入，自嘲有病，先辦《參閱文稿》後辦《香港傳真》，依舊是民間傳統，在野精神，還不斷向老友們重複自己的「生命機會成本說」。亞洲金融危機，日本大叫「亞洲有事」，我在日本有年，也順口談些日本觀察，在他的鼓勵下，陸續寫了出來。一晃十年有餘，陸續在《香港傳真》印些文字，居然可以系統整理，結集出版，照南懷瑾老師的說法，確是借了小強的光。

早已遠去的1980年代，被稱為「新啟蒙時代」。北京的學界圈子，似乎主要有兩種不同傾向。一是立足於中國的實證研究；一個是學習西方。我所參加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，代表著實證研究的那種傾向。「發展組」當年的口號是「多學科、高層次」為改革服務的政策研究，目標方法，十分明確。其實那種實證，並未忽略吸收國外的經驗知識。1985年「體改所」組織過一次全國性調查，總報告題為《改革：我們面臨的挑戰與選擇》，集體寫作，小強主筆，開首就講，中國一面受成熟的歐美市場經濟體制之苦，一面受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之苦。我所在的社會政治室參加了這個調查，

分析勞動力、福利、社會保障的三位一體的構造問題，在「兩苦」之間，尋找市場和社會保障、效率和公平的平衡點。日本模式中的「產業政策」、「終身僱用」之類，引起不小的興趣，並且常常延伸到「日本和俄國現代化」的話題。

學習西方的另一種傾向，激發起1980年代的「新啟蒙」，《讀書》雜誌和《走向未來》為其傑出代表。在包遵信、金觀濤等主持之下，《讀書》常有討論會，因為投過幾篇稿子，有緣參加一些會議，結交不少朋友。那時候，還沒時興名片，眾人大侃一通之後，往往找個小店吃飯，再拿個本子或者紙條互留姓名。1984年初，到蛇口工業區參加研討會，由何維凌引介，在船上和老包、金觀濤說起自己在研讀韋伯著作，可惜沒有譯本。後來由王焱負責，從帕森斯的英譯本，與人合作翻譯韋伯的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，收入《走向未來》叢書，並寫了一個書摘，發表在《讀書》1986年第1期。為了系統地引進西學，維凌主持為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《現代社會學比較研究叢書》，我做具體工作，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社會學著作。

提起陳年舊事，無非想說這本《方法的日本》，源於這些舊事的影響。筆者與日本素無淵源，研究日本屬半路出家。1989年到東京大學，想做一個改革與日本模式的課題，同時學習日語。此前，有一年多在國際大學讀書，那裡是美國式的研究生院，教學全用英語，說道日本，倍感隔膜。沒想到，機緣意外，到東京而成「滯在」，比較研究而成「參與觀察」，柴米油鹽，衣食住行，從頭來過，其中艱辛不足道，大抵有過洋插隊經驗者皆可想見。寂寞與無奈之中，奔忙勞碌夾帶遭人白眼之餘，讀書人的痼疾，難以放棄讀書寫字，加之參與觀察，也許比之於隔膜中人多了些許直感。

初到東京，正趕上日本泡沫輝煌。看電視節目練聽

力，不少在討論股市樓市行情。印象深的是那種搶答題。問：哪兒的地價世界第一？答：銀座某處地王。問：東京的地價相當於美國加州，還是美國全土？答：美國全土。經濟動物日本，到此可謂全盛，湧動著一片暴富的浮躁氣氛。日本以製造業和貿易立國，貿易黑字，外匯儲備，「日本世界第一」，據說「威脅」到了美國的戰略利益。報刊登了不少「日本收購美國」和「打擊日本」的文章，電視展示美國人砸日本家電和汽車。中國人不在日本的視野之中，豐田汽車拒絕在中國設廠，中國製造的鞋和衣物，扔在百貨店外邊的筐裡。美國大學流行學習日語，精通日語的美國人成了日本的電視明星，顯身說法，大約使日本人的虛榮心極大滿足。緊接著是美國的一系列對應，美日關係大變局，也是本書一些章節分析的內容。

一位中國領導人，訪日親民，讚賞日本「電車」（城鐵）裡人人讀報，個個看書。的確，這是一個良好的習慣。每天擠電車上下班，我也一樣，因為不能打電話，更不能高聲說話。日本這個國家，就像一輛滿員電車，人人都在埋頭自己的事情，至於電車奔哪裡開，卻盲人瞎馬。泡沫破滅的時候，「日本電車」出了車禍，個個猝不及防，社會亂像疊出。也許是慘烈的戰敗，讓這個民族學會了處變不驚？蕭條之下的日本，依舊按部就班，內心的掙扎都在失業率、過勞死、自殺率一類冰冷的數字裡，連新宿車站地下不斷增加的homeless，表情也是平靜的。不平靜的是政治和對外關係。長期執政的自民黨分裂，只好與其他黨派聯合執政，政治舞臺上角色變換不斷。其中小泉內閣奉行新自由主義，推行「構造改革」與美國「接軌」，一時贏得一片叫好，還有選票。不過，好景不長，改革無路可走，自民黨終成野黨。

所謂「方法的日本」，也是將中國與東亞的歷史，連貫起來的思考。中國改革初期，學習過日本模式。在推動

改革的老一輩的回憶中，日本的高速鐵道、公路、汽車的發達，出口導向政策，甚至於威權主義的政治，都得到關注和參考。轉瞬之間，那個時代，已成過眼煙雲，統統落伍。1990年代初，冷戰解體，美國式資本主義全球化，世界各國統統接軌轉型，忙的一塌糊塗，中國，日本，都與美國「接軌」，苦於總是接不上。美國金融危機，突如其來，大約才發現「接軌」的漏洞百出。日本在「親美入亞」、「脫美入亞」的軌道上徘徊，最終的道路，大約取決於「中國世界」的復興，而這個復興需要一個「亞洲的文化革命」。

亨廷頓文明衝突，將中國文明、日本文明分列。差異俱在，但是，是否為另外一種文明？存疑。中國是日本的「希臘羅馬」，那是史實。除了切身觀察之外，筆者自修日語，讀了不少日文書籍。日本越老的書，漢字越多；越老一輩人，越通漢學。至於古籍，則全用漢文。不習漢字，幾乎無法學習他們自己的歷史。日本出版業發達，東京神田一帶有個書店街，各種專業舊書店，一家挨著一家。喜歡逛書店、尤其是舊書店的我，就從那兒開始購書，全是便宜貨，包括一批學術經典。《明治漢詩》就這樣發現。國內沒有專家寫過，於是選編了一下，加上一篇序文和人物介紹發出，這次也附錄在書裡了。

在學校呆了幾年之後，為了養家糊口而入「商社」，業餘時間，繼續研究。因此，寫一篇稿子，花很長時間。〈日本改憲〉一篇東西，花了兩年多。學會電腦寫作，把一些資料帶在身邊，走到哪兒寫到哪兒。有的是在東京辦公樓，那裡有個不錯的圖書文獻室；千葉船橋的社宅，附近有個很好的圖書館；有的是在國內出差途中，山南海北。每到當大學教授的朋友的研究室，見人家四壁皆書，寧靜書齋，不免心生嫉妒，可惜自己沒福。不過，儘管業餘，寫作還是認真的。中信泰富研究部的諸位更認真。一

個美國退任大使，批評民主黨小澤一郎關於美日同盟的言論，發在《日本經濟新聞》上，我註釋的日期有誤，張幸仔幾次來電詢問，非找到原始的剪報才罷。楊瑩、梁曉，還有北京《中國稅務》雜誌社綜合研究組的幾位，都幫我編輯過文稿，這裡一併致謝！還得感謝老母健康，感謝妻子小惠，女兒豆豆、東東，十幾年來北京、東京、上海，隨我到處奔波，聚少離多，原諒我不問家務。

感謝承志先生的序言，他從自己的角度描繪著「歸亞的方向」。他的〈魯迅路口〉是我最有共鳴，也最喜歡的散文，又因為《香港傳真》得以和他結識，當然我早就讀過他的不少作品，在日本卻沒有見過面。日本問題的討論，山南海北的聊天，相似的日本經歷，相近的社會和人的觀察，他的《敬重與惜別》的兩個詞，也許最好地概括了共同的日本觀，只是，在他那裡，亞洲不止是我所關注的東亞，還有更加廣闊的伊斯蘭世界，中亞、西亞、阿拉伯、巴勒斯坦。

最後，這個拙劣的集子，能在大風出版，筆者倍感榮幸！這個出版社，老中青三人行，南懷瑾老師題詞，王小強主編，楊瑩社長等人編輯、製作、發行。每出一書，必先讀為快，有的書竟至於洛陽紙貴，風起雲揚。筆者忝列其中，自慚形穢。得南懷瑾老師、王小強老友厚愛，算是遊歷歸來的一個交待，以此就教於讀者。

著者謹識

2011年1月15日